

# 中国灵魂争夺战

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



## 目录

---

概述	1
总论	4
变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机制	15
图表：关键的宗教控制手段	24
地图：各省宗教迫害情况	25
I. 汉传佛教和道教	26
II. 基督教	42
III. 伊斯兰教	66
IV. 藏传佛教	86
V. 法轮功	108
建议	130

## 关于作者

---

萨拉·库克是自由之家资深东亚研究分析员，为本项目主任以及报告作者。她主持《中国媒体快报》，每月一期，以中英文两种语言提供有关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新闻和分析。她还是两份自由之家特别报告的作者：《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以及《中国审查制度的阴影：中共媒体管制如何影响全球新闻媒体》（2013年）。

## 研究、编辑和顾问团队

---

五名精通中国宗教群体的专家（三名博士候选人、一名独立研究员、和一名记者）为本报告的五个章节提供了研究支持，但他们希望保持匿名。Tyler Roylance (自由之家编辑), Annie Boyajian (自由之家倡议负责人), 以及实习生Bochen Han 与 Cathy Zhang 提供了编辑和研究协助。三名希望匿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担任了学术顾问。

## 致谢

---

本报告因为得到了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特别感谢Arch Puddington, Daniel Calingaert, 和 Robert Ruby提供意见和反馈。Garry Fey 担纲图像设计师。

## 封面说明

---

在2016年2月藏历新年期间，大量中国军人在甘肃省拉卜楞寺外聚集，防止抗争爆发。(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 II: 基督教

### 迫害严重程度:

天主教

中度

基督教新教

高

### 迫害变动趋势:

天主教



略有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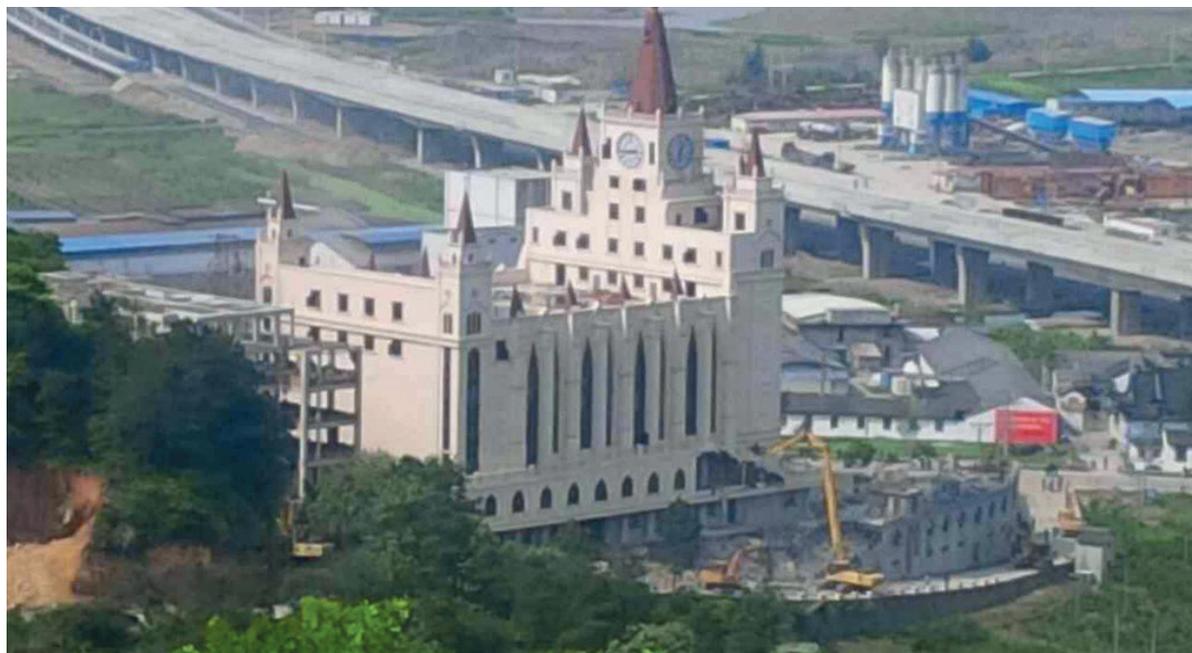
基督教新教



增加

### 主要调查结果

- 1 信仰复兴:** 自1980年以来, 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迅速扩张, 到2014年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据估计分别达到5800万和1200万, 其中注册和非注册信众的人数基本各占一半。城市中受教育专业人士和富裕企业家的信仰人数显著增长。
- 2 主要政治管控措施:** 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对基督徒进行管控——鼓励有时甚至是强制他们加入国家认可的教会。这些教会隶属于各种“爱国教会”, 并受“政审合格”的神职人员领导。那些因神学或其他实际原因而拒绝在国家认可的教会登记注册的宗教领袖和信众, 将遭遇礼拜活动场所被查封的风险, 并会面临拘禁、殴打、失业甚至入狱。
- 3 习近平治下的基督教:** 自2014年初以来, 在官方有关“西方”价值观和宗教“中国化”的一片声浪中, 地方当局采取了更多手段来遏制基督教的传播。他们使用了一些以前甚为罕见的打压措施, 包括把矛头指向政府认可的教会及其领导人、抓捕受理涉及基督教案件的人权律师、阻扰圣诞节庆祝活动等等。在最近对一些被政府认定为“异端”的类基督教团体的打压行动中, 有超过400名宗教领袖和信众被捕入狱。
- 4 十字路口的天主教:** 北京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似乎即将取得积极突破。据报导, 双方正在致力于达成一项协议, 事关对于中国一下子出现的超过40个主教职位空缺, 如何任命教皇和共产党双方都能接受的主教。
- 5 回应与抗争:** 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引发了来自教会领袖和信众的强烈反应, 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官方“爱国教会”的颇具影响力的人士。基督徒们发表联名信、抵制官方庆典仪式、举行室外礼拜、声张他们的合法权利, 甚至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官方拆除十字架。很多基督徒也采取了更为细致的战术来削减政府管控的影响, 比如将传教活动与慈善活动相结合、参加私人组织的山区讲习班 (mountainside trainings)、培养与当地官员的合作关系从而减少遭受迫害的可能性。



浙江省三江教堂是一个受政府认可教会的财产。这是三江教堂2015年4月被拆毁前和被拆毁后的情景。

图片来源: Shanghaiist/China—in His image (英文博客)



“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习近平在2016年4月的讲话 <sup>1</sup>

“我会强烈要求[省民宗委]…立刻停止此类撕裂党群关系的拆除十字架的谬行。”

—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发表于2015年7月的一封信公开信 <sup>2</sup>

## 历史演变

基督教据信最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来到中国，但到了唐王朝灭亡的公元907年，它已经被打压殆尽。在元朝统治下的13世纪，基督教重新在中国出现并且经历了周期性的起伏消长——取决于基督徒与帝国统治者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sup>3</sup> 在民国时期（1911-1949），像孙中山和蒋介石这样的首脑人物都是基督徒。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当政之后，中国政府驱逐了外国传教士。在1950年代，中国成立了几个“爱国教会”，从而在切断与外国教会之间关系的同时，建立起党和政府与中国数百万基督徒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Protestant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sup>4</sup> 成立于1957年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sup>5</sup>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是隶属于政府的宗教团体也遭到解散，所有的公开宗教活动都被禁绝。不过，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主导了一段相对的宗教开放时期。那些爱国教会得以恢复，政府还提供资金修复教堂和一些重要的宗教圣地。

“他们（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导是共产党，而我们的领导是耶稣基督。”

但即便在这一段更为宽容的环境中，周期性的镇压也是中国基督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征，尤其是针对那些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的教会和宗教领袖。由于中国政府将基督教视为西方国家发挥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和西方价值观与民主理念向中国进行渗透的管道，因而经常由于某些有国际关联的事件而引发中国对基督教团体的打压。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所发生情况就是如此。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某些团体，其影响力一旦超越了他们的省份，便会因“邪教”<sup>6</sup>的名义被查禁。<sup>7</sup>

镇压运动的典型特征通常包括突袭未经登记的查经聚会或宗教仪式、抓捕数百名宗教领袖和信徒。在胡锦涛当政期间，绝大多数被捕的人在短期行政拘留之后都被释放，但每年都有数十人被判处“劳教”或入狱。<sup>8</sup>

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年里，中国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官僚机构日益庞大，规章条例日益繁多。随着2005年实施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海内外的一些观察人士曾经乐观地估计这些新的条例或许能让家庭教会获得登记注册，并且无需隶属于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然而，那些教会领袖和试图帮助他们的律师们很快发现登记注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尝试都是危险的。结果，到了2010年，只有为数不多的信众团体获得注册，在北京一地据估计有2000间家庭教会，而相比之下只有5所“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及8个下属的聚会地点。<sup>9</sup>

那些一直拒绝加入官方认可教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和会众，就他们的犹疑给出了神学的和实际的理由：

- **神学理由：**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争论的焦点是他们对梵蒂冈权威的信仰。正如教皇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一封信中写道的，“如果一个教会旨在‘独立’于罗马教廷，就宗教层面而言，这是与天主教的教义相违背的。”<sup>10</sup> 有些新教教徒也表达了类似的关切，他们认为“他们（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导是共产党，而我们的领导是耶稣基督。”<sup>11</sup> 还有一些基督徒则发现“爱国教会”为了迎合中共优先关注的问题而更改教义，而这些更改是与他们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大相径庭的。
- **历史理由：**有些非官方教会的宗教领袖和信众则因为厌恶那些“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袖们在毛泽东时期迫害基督徒的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而拒绝与之伍。<sup>12</sup>

- **官僚制度：**对于很多非官方教会而言，与申请注册相关的种种行政要求令人不堪重负而且不切实际。<sup>13</sup> 而一个教会一旦登记注册，政府则时常会干涉教会活动的管理，甚至布道的话题。有时，在一个地理辖区之内，获得许可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数量是受到限制的，这意味着一个非官方教会必须与一个更大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合并而不能自己单独注册。<sup>14</sup> 数量有限的官方教会又导致教堂人满为患，这从而又刺激了非官方会众团体的形成。<sup>15</sup>
- **安全原因：**登记注册的要求之一是申请人须向宗教事务官员提供成员名单。鉴于以往的宗教迫害运动，很多家庭教会领袖们不愿意这么做，主要是担心这些信息可能被当局用来骚扰他们的会众成员。<sup>16</sup>

## 基督教在当今中国

尽管时不时地遭遇打压，有时在某些地区甚至是残酷的迫害，自198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总体上的发展轨迹还是呈现出显著的增长，其中包括胡锦涛当政的十年。在中国很多地方，当地官员和教会（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之间形成了合作的或者至少是容忍的关系。

各种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估算悬殊很大，部分是由于未注册教会礼拜的信众不大可能在人口普查或舆论调查中坦言他们真实的信仰。2014年，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的报告说，中国有在政府注册登记的2900万新教徒和570万天主教徒。<sup>17</sup> 而可资利用的调查和学术研究结果则显示，至少另有同等数量的信众在非官方注册场所进行礼拜活动，由此得出的估算是有5800万新教徒和大约1200万天主教徒。<sup>18</sup>

这些时常为观察人士所引用的信众人数，使得中国基督徒的总人口达到7000万，也使得基督教在中国成为继汉传佛教之后第二大有组织的宗教。有些学者和福音派机构相信中国基督徒的实际人数可能高达一个亿，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非官方教会。<sup>19</sup> 由于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对基督徒人数的估算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有些地方这两种教会的领袖们达成默契，信众个人可以在多个场所进行礼拜。<sup>20</sup>

中国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包括诸如星期天的礼拜仪式、查经小组、祈祷会、圣餐礼和洗礼等常规活动。中国的天主教徒会为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母升天节等节日举行特殊的仪式（大弥撒）。<sup>21</sup> 中国的新教徒也纪念圣诞节和复活节。有些中国基督徒，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会进行一些糅合了基督教和中国民俗传统——诸如祭祖和看风水等等——的“复合型”活动。<sup>22</sup>

收入较高的中国人开始将基督教及其与西方富裕国家之间的关联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

即便是从官方资料来看，基督教的传播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些数据只包括了年龄在18岁以上并在注册教会进行礼拜的信众。这些数据显示，新教徒人数从1982年的300万增长到了2014年的2900万，增长近10倍。<sup>23</sup> 或许在过去十年，基督教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城市地区。这一增长导致了被一些学者称为“老板基督徒”的出现——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sup>24</sup> 虽然如此，基督教在农村地区也依旧盛行。<sup>25</sup>

基督教的增长可以部分的归功于在毛泽东死后，由于管制的放松而带来的广泛的精神追求的复兴、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经济繁荣，以及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很多中国人失去吸引力之后而产生的道德真空感。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因素推动了基督教的扩张，而代价或许是汉传佛教和道教等更加“本土”宗教的式微。<sup>26</sup> 有些专家认为，在“文革”期间对所有宗教的严厉打压重新配置了“宗教市场”，而其他中国（本土）宗教影响力的衰落则为基督教在中国赢得立足之地创造了契机。同时，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并致力于一个庞大的经济发展规划，很多大学生

和收入较高的中国人开始将基督教及其与西方富裕国家之间的关联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最近，由于中国敌视宗教的政治环境，新教“家庭教会”在组织结构上的灵活性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和新信众的加入。<sup>27</sup>这与汉传佛教和道教的状况形成了对比，这些宗教的活动与实体性的庙宇建筑紧密相连，而这些建筑通常都是固定的、时常甚至是一些古迹，特别容易受到政治管控和限制。

在社会经济和结构性的因素之外，尽管劝说他人改变信仰从严格法律的意义上是受到禁止的，但是巧妙的传教手段直接促进了基督教呈指数级增长。比如，中国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发起和参与慈善工作。一些大型基金和机构的运作得到了政府的认可，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能够募集数百万美元的救济资金。还有其他一些较小规模的活动，诸如通过当地教会赞助医疗诊所、文化演出或社会项目。这些活动项目给中国基督徒提供了个人精神满足和“做善事”的管道。它们也间接地向那些非信众展示了宗教对个人和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并给基督徒提供了一个与陌生人互动的机会，同时还潜移默化地分享了他们信仰的原则与益处。<sup>28</sup>

### 习近平治下的基督教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掌中共，基督教此前在中国业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大规模增长，但国际人权倡导团体也注意到，在过去若干年有一股逐渐抬头的迫害宗教的势头。<sup>29</sup>由于官方对几位主教的任命没有得到教宗的认可，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而“家庭教会”则面临注册登记、与“三自”教会合并甚至遭查封等日益沉重的压力。<sup>30</sup>

这位新领导人上台伊始，似乎形势并无明显变化。不过，人们还是注意到2013年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数十起打压事件，尤其在北京、河南和山东。<sup>31</sup>到2014年底，针对基督徒，尤其是对新教徒和几个不同的“类基督教”团体的迫害事件出现了激增。<sup>32</sup>中国的一些过去给基督教提供相对宽松环境的地区成为新的引人注目的镇压区域，直接遭受政府迫害的基督徒人数比过去多出数千人。这种高强度镇压行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和2016年初。<sup>33</sup>

在迫害日益加强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当政后，出现了若干新现象：

到2014年底，针对基督徒的迫害事件出现了激增。

**1. 拆除十字架运动：**自2013年3月开始，浙江省各地当局开展了一场为期三年的所谓“三改一拆”运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教堂建筑。到2016年中期，至少1500座教堂的屋顶或墙面上的十字架被拆除，超过20座教堂被摧毁。<sup>34</sup>运动最初是在温州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然后很快波及全省，甚至蔓延到农村乡镇。成为打击目标的主要是新教教堂，不过也有数十处天主教礼拜场所的十字架遭到拆除。这场运动到2016年初依然在迅猛开展，据报仅在2016年3月3日一天就有49处十字架被拆除。<sup>35</sup>

当局试图用“违章建筑”、“违反规划”等借口为其之前的强拆行为辩护。在某些案例中，有的教堂确乎超过了政府批准的范围，<sup>36</sup>但是政府的内部档案则显示出，这场选择性的以教堂为目标，集中拆除十字架的“三改一拆”运动还有其他动因。<sup>37</sup>虽然不如浙江省这样系统性地进行，但是在福建、河南和安徽等基督徒相对较多的省份据报也出现了强拆教堂的情况。<sup>38</sup>

这场运动的规模以及与之前对基督教的宽容所形成的反差，已经在中国的基督教群体中产生了一种危机感。2014年以前，浙江省是一个对基督教相对开放的省份。当局对基督教采取了宽松的政策，甚至未经注册的基督教团体也能获准建造自己的礼拜场所。有报导的迫害事件寥寥无几。<sup>39</sup>而在过去两年，由于信众们试图抵制官方的打压运动，紧张关系日趋

升级，静坐抗议、大规模拘禁和部署防暴警察等状况日益频繁。<sup>40</sup> 有些抵制行动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在2016年4月，河南省一名牧师的妻子遇害，当时她和她的丈夫因试图阻止政府拆除他们的教堂而遭推土机掩埋。<sup>41</sup>

- 2. 对政府认可的教会及其领袖的打压：**浙江省此次“反十字架”运动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大量“三自爱国运动”教会下属的教堂成为打击目标。由于来自政府许可的教会的牧师，甚至那些政府下属的各种“爱国”宗教协会的领袖们，一直力图规避政府的干预，他们也要面对拘留和监禁等惩罚——如此待遇在过去只属于他们的那些“家庭教会”同仁们。

其中最为突出的案件当属包国华案和顾约瑟案。包国华是政府下属的中国基督教协会成员和一座政府许可的教会的牧师，他在2016年2月被判入狱14年。<sup>42</sup> 顾约瑟是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和一座政府许可的大型教会的牧师。这座教会曾经被政府树立为中国宗教自由的典范，顾约瑟牧师被开除出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并于2016年1月至3月遭到拘押。<sup>43</sup>

中国政府声称这两起案件都涉及财务问题，但是这二人公开反对拆除十字架运动的立场，以及他们遭遇惩罚的时间点都让很多观察人士相信政府对他们的指控是捏造的和报复性的。严惩“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牧师的案件在浙江省之外也有所报导，其中包括2014年河南省判处张少杰牧师入狱12年。<sup>44</sup> 在2013年之前，“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导人受到如此惩处的案例非常罕见。<sup>45</sup>

- 3. 大规模拘禁“邪教”组织成员：**自2014年初开始，中国各地当局强化镇压，甚至铲除各种“类基督教”派别团体，这些派别与主流的新教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些团体的数百名神职人员和信众遭到拘禁或被判入狱。这次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2014年5月的一起事件而引发。据称这次事件中，一名妇女由于拒绝向那些劝说她入教的人提供电话号码，在山东省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被数名“全能神教”（亦称“东方闪电”）信徒殴打致死。<sup>46</sup>

然而，对中国法院若干判决的一份分析结果显示，此次运动打击的目标还包括与麦当劳餐厅事件无关的其他8个“类基督教”团体。<sup>47</sup> 在这些法院判决中，大多数人被判入狱似乎是因为他们和平地行使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非由于涉及对他人实施暴力。这次运动中被清除的人士都是根据《刑法》第300条遭到起诉。这一条款用来惩治“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依法最高可以判处（被告）无期徒刑。此法条创制于1999年底，用于开展镇压法轮功团体的运动（详见法轮功章节）。法庭档案显示，至少有439名来自各“类基督教”团体的人士，在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之间根据这一条款被判处最高10年刑期，各起案件涉及28个省和直辖市。<sup>48</sup> 有关起诉在2014至2015年达到高峰，2016年初开始放缓，大约80%的起诉与备受争议的“全能神教”有关。<sup>49</sup>

这些调查结果有助于解释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所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注意到在2014年基督徒被判入狱的人数急剧增加。<sup>50</sup> 但是无论主流新教领袖还是来自地下“家庭教会”的会众都有人因《刑法》第300条的规定而遭到指控和判罪，这一现象显示一个旨在迫害某一个宗教团体的压制性法律工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施加其他团体身上。事实上，据说有几位政府代表对一位人权律师解释说，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任何非官方宗教团体都可能被当作“邪教”并因此受到惩处，无论这个团体是否在政府查禁的名单上。<sup>51</sup>

来自政府许可的教会的牧师，他们也要面对拘留和监禁等惩罚——如此待遇在过去只属于他们的那些“家庭教会”同仁们。

4. **打压协助教会的律师：**多年以来，那些代表受迫害信众的律师一直面临官方的打击报复，手段包括剥夺律师资格、监控和人身伤害。在2012年之前，有少数维权律师遭到拘留和监禁，比如高智晟和王永航律师，但这似乎是由于他们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引发并非是由于基督徒。在习近平治下，维权律师被捕入狱的人数总体上有所上升。作为2015年7月开展的镇压运动的一部分，若干曾经协助受迫害基督徒的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被捕，遭遇数月的拘禁、虐待和强迫在各种媒体上认罪并诋毁自己维护人权的工作。突出案例包括张凯律师案和法律助手赵威案。<sup>52</sup> 其他一些律师，比如李和平，直至2016年9月还依然被拘押，并将面临“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sup>53</sup> 据报导这三位当事人自己都是基督徒。
5. **加强阻挠圣诞节庆祝活动：**圣诞节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商业性节日，<sup>54</sup> 但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当局开始在全国不同地方采取措施防止基督徒在一起进行礼拜或庆祝圣诞节。<sup>55</sup> 非官方的教会报导说，他们在组织大型的祈祷会或聚会时遇到了更大的障碍。西安市和温州市的政府当局则采取措施限制儿童参与圣诞节，还在2014年禁止大学生庆祝圣诞节。<sup>56</sup>

总而言之，种种这些趋势反映了有关新教团体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些潜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学者特蕾莎·怀特 (Teresa Wright) 和建瑞珍 (Teresa Zimmerman-Liu) 在2013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描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教关系的各种不同模式，其中包括对注册教会更加宽容、在浙江和广东这样省份赋予非官方基督教团体更大的自治权以及在城市地区较少使用暴力镇压手段等等。<sup>57</sup> 从上述的分析很容易看出，自2013年以来在中国的一些重点地区此类政教关系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激发了中国当局与官方和非官方新教团体之间更大的冲突。

镇压运动的加强及其所采取方式的背后有多种原因。首先，基督教的日益普及或许激发了某些中共领导人采取反制行动。基督徒人数的可靠估算为7千万至1亿，这使得基督教恰好达到了法轮功在1999年的同样规模，当时中共对法轮功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镇压。这个人数也使得基督教信众几乎和中共党员人数一样庞大——2015年，中共拥有差不多8800万党员。<sup>58</sup> 与法轮功相比，尽管中国的基督徒在领导方式、教义和宗教活动等方面都更加松散，但是其信众庞大的人数和公众可见度或许已经惹得中国领导人寝食难安。

## 西安市和温州市的政府当局则采取措施限制儿童参与圣诞节。

除此之外，基督教在全国各地的汉族人当中进行传播的各种管道遍及从贫困农民到富有企业家的各个社会阶层，并且建立了跨省份和跨国（包括通过互联网和维权律师）的联系网络。所有这些特质都符合一些专家认为的导致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理由。<sup>59</sup> 一份在一些媒体报导中被引用的政府内部文件明确表示，浙江省的拆除十字架运动的目的就是管制“过分普及”的宗教活动。<sup>60</sup>

导致加强镇压的第二个因素是，官方越来越强调“中国化”基督教并使之“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应措施早在2012年11月之前业已存在，但是这种论调在之后已经蔚然成势并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在2015年5月的一次讲话以及后来在2016年4月的几次谈话中，习近平提出了中共宗教工作的“四个必须”，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化”，包括宗教教义的中国化。<sup>61</sup> 虽然在实践层面人们对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化”依然有些不知所云，不过已经看到一些表面上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涉及到教堂建筑的“本土化”——实际上就是降低教堂的公众可见度。这是2014年底在浙江开展的一场运动试点的重要内容，这场运动就是在浙江省内的基督教小区实施“五进五化”。<sup>62</sup> 对教堂建筑的重点关注有助于解释拆除十字架和其他对教堂外观的改动。到2016年中，其他方面明显的“中国化”包括，从一些带有民族主义的措施，像要求在教堂建筑上挂国旗，<sup>63</sup> 到一些更加莫名其妙的倡议，像在基督教会众当中推广中国茶文化。<sup>64</sup>

当前打压趋势背后的第三个因素有关反西方的政治环境以及习近平领导下进行的意识形态整顿，包括官方针对外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海外“敌对势力”对宗教领域的渗透所发出的警告。此类言论，再加上尤其针对新教教徒的各种强化限制措施，似乎反映了中共对这样一个去中心化宗教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焦虑——这个宗教的领袖们与像美国 and 南韩这样的民主国家的教友们有着私人联系，即便基督教实际上已经相当“中国化”了。

至于具体说到浙江省逐步升级的紧张形势，省委领导人的主动发起以及该省主办一个国际性政治峰会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2年12月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一直与拆除十字架运动有着密切关联，据传闻他在2013年10月的一次温州之行中说，大量明显的教堂建筑和十字架似乎与风景不“协调”。<sup>65</sup> 中国于2016年9月在省会杭州举办20国集团高峰会议则引发了当局另一轮措施，加快遏制基督教在这个城市的公众可见度。<sup>66</sup>

在习近平于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夏曾经是习的副手。<sup>67</sup> 这种密切的关系也使得人们推测习近平自己或许也插手了镇压运动的发起。<sup>68</sup> 由于没有渠道获得中共的内部数据，因此无法得知实情。但是这场运动已经持续了两年，引起了国内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批评，而习近平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

### 十字路口的天主教

尽管中国的天主教也受到了上述事态的影响，尤其是浙江的拆除十字架运动，<sup>69</sup> 但是政府对待天主教政策的总体轨迹不同于新教所面临的局势，而且似乎很有可能出现积极的变化。在经历了2010年至2012年中国与梵蒂冈关系的明显恶化之后，到2016年年中围绕双边关系出现了一种乐观情绪，并且有希望获得某种突破，尤其在有关主教任命问题上。

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3月就职，仅比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主席早三天。几乎上任伊始，这位新教宗便开始对中国和习近平本人频频示好。他在当月就给习发去贺信，还任命了某位有中国经验的人物担任梵蒂冈的高级外交官，并试图在2013年9月同时访问美国期间与习近平会面。教宗试图获得北京方面青睐的努力在他的言辞中也显而易见。在2016年1月的一次媒体访谈中，他表示敬佩中国伟大的文化和古老智慧，还向习和中国民众发出了农历新年问候，一位教宗向一位中国领导人做出如此姿态还是前所未闻。<sup>70</sup>

北京方面已经注意到教宗的这些努力。在2014年7月至2016年1月之间，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代表举行了三轮非正式会谈，<sup>71</sup> 同时中国国家媒体对教宗方济各的报导也一直相当正面。<sup>72</sup> 北京方面避免单方面任命主教，2015年8月一位得到双方认可的主教在河南省就职，这是三年中第一例此类任命。<sup>73</sup> 2014年8月，中国允许教宗在访问南韩返程时飞越中国领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出这样的许可。

由于主教职位在中国累积了大量空缺，双边关系出现明显解冻的时间点就尤为意味深长。职位空缺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是源于在1949年以前任命的老一代主教或是退休或是去世。如果北京不经过梵蒂冈的认可而在这些职位上哪怕是部分地任命自己的主教，那么非法主教的人数就将从不到10人上升到超过30人。这将会加深天主教领袖们之间的裂痕，他们中有些是只被梵蒂冈承认的，有些是得到双边认可的，而有些则仅仅是中共机构任命的。教宗方济各或许是有意想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尽管他最近的努力同梵蒂冈与全世界共产党政府达成和解的政策是一致的。

从北京的立场看，有若干因素使得教宗方济各成为了一位比他的前任更有吸引力的对话者。首先，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阿根廷）而非西方欧洲国家的国民，人们会觉得教宗方济各

不太会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工具，而中共一直担心有人利用宗教权威来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

其次，作为第一位耶稣会教宗，方济各表示自己与中国有着特殊而强烈的联系。耶稣会士们在向中国引入天主教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一些奉命（前往中国）的耶稣会代表们，如16世纪的利玛竇（Matteo Ricci），与中国的帝国朝廷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关系。<sup>74</sup>

第三，教宗方济各所表达的对中国伟大历史与文化的敬佩与习近平自己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吻合。教宗示好的举动看上去已经产生了一些良好效果，一些政府下属的天主教机构的领导人敦促双方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并允许教宗访问中国。<sup>75</sup>

最后，由于在全国各地只有1200万信徒，尽管存在与境外宗教权威的联系，但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地理分布范围，天主教或许是中国最没有政治威胁的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利用当前时机缓和与教宗的紧张关系，尤其是一位大家认为不太可能利用权力去刺激反共情绪的教宗，将会改善习近平的国内国际形象。

随着幕后谈判的推进，观察人士相信桌面上可能会有三种神职任命的安排方案：

- 梵蒂冈向北京提供一份可以接受的候选名单，北京方面来做最终选择。在越南就是采取类似的模式。
- 梵蒂冈做出具体选择，但之后必须通过中国官方管道获得确认。
- 北京方面采取主动，但给予候选人足够的时间以赢得梵蒂冈的认可。在过去10年里，若干神职任命采取了这种方式。<sup>76</sup>

从北京的立场看，有若干因素使得教宗方济各成为了一位比他的前任更有吸引力的对话者。

尽管在梵蒂冈和中国天主教徒中存在一种期望和乐观情绪，但是在香港和大陆都另有一部分人对双边恢复邦交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北京会迫使梵蒂冈做出让步从而加强政府控制，但又未必会减少（对信徒的）暴力迫害和监禁。不过，对于那些既想效忠梵蒂冈又想免遭政府迫害的天主教徒们而言，双方关系的改变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道德窘境，而且能够使得教会内部被教宗认可的和未被认可的各方更加团结。

2013年3月以来实际的事态发展增加了怀疑论者们的担忧。即便是在中梵关系改善的背景之下，对地下主教和神父的拘押一直时有发生。<sup>77</sup> 上海的马达钦主教2012年在他的神职任命仪式上与“天主教爱国会”（CPA）分道扬镳，之后他一直被软禁在一所神学院内的家中。2016年6月，一篇以马达钦的名义发表的博文文章公开承认当时的决定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解释说“受到外界的蛊惑”，还赞扬了“天主教爱国会”。<sup>78</sup> 有些观察人士质疑这篇贴文的真实性。他们注意到（马受到）政治高压和“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如果这篇文章确是出自马的手笔，<sup>79</sup> 同时还对梵蒂冈在这一事件上保持沉默表示震惊。<sup>80</sup>

另外，2013年4月，政府实施了一套更具限制性的有关主教任命的新条例，以取代1993年开始实施的旧条例。<sup>81</sup> 新条例明确要求（主教任命）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并且将主教任命的最终决定权赋予了中央有关当局——尤其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国家宗教事务局，从而使得主教教区更加难以通过与地方官员的良好关系而获得商讨的余地。

重要的是应当注意这并非第一次出现希望。当前正在探讨的有关主教任命的提议在2007年也曾

讨论过，但仅仅三年之后双方关系又趋恶化。<sup>82</sup>

### 政治管控的关键手段

中国当局采用了若干主要策略来影响政府认可的教会的发展，同时遏制非官方教会的盛行和成长。

- 1. 官僚机构的监管和登记注册的压力：**中国的党和政府对基督教实施控制的基础是政府在各地的宗教事务局系统和各种“爱国”协会，包括“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新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些机构的章程传达了他们明确的政治优先级。学者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注意到“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章程“强调服从党的领导，拥护政府的权威和社会主义祖国。”<sup>83</sup>

与这些协会密切合作的教会和宗教领袖们会得到政府资金以及获准去官方神学院受训，但是必须保证做到“三个固定”——固定集会地点、固定领导和固定覆盖范围，还要拒绝接纳18岁以下的会众。<sup>84</sup>很多教会领袖和会众宁可在政府管控之外运作，从而保持更大的自治，尽管这样会带来风险。

同时，中共自己官僚主义的限制使得官方教会实际上不可能满足国内所有基督徒的需要，规则又不允许没有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或“天主教爱国会”的教会获得政府注册。<sup>85</sup>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法律管辖之外的信仰空间，而地方官员则一直采取各种不同手段迫使那些未注册的团体或是解散或是与附近的官方教会合并。

- 2. 对礼拜场所的限制：**很多被报导的迫害事例都涉及到地方当局为了限制基督徒在特定的地点进行礼拜、集会和培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其中包括，用周期性的突袭驱散未注册教会的《圣经》培训课程，向业主施加压力取消租房协议从而阻止未注册教会在他们选择的地点集会。<sup>86</sup>在更加极端的案例中，安全人员会切断教会场所的水电，阻止信众进入或是拆除教堂建筑。

直到最近，这些手段都主要是针对未注册教会，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城市会众团体比如北京守望教会，试图迫使信众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或是拆分成更小和不那么有影响的团体。<sup>87</sup>然而在过去三年里，越来越多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也遭遇了对他们礼拜场所的限制、强拆或是与地方当局的物业纠纷。<sup>88</sup>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遭遇骚扰和强拆的趋势则根绝了非官方教会申请注册的所有想法。

- 3. 对神职人员的管控：**各种“爱国”协会的一项关键功能就是培训、任命、指派和管理神职人员。中共希望培养能够教导信众们“爱国”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爱国”宗教领袖。<sup>89</sup>24所国家和省区级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神学院和13所“天主教爱国会”的神学院承担了这些培训工作。<sup>90</sup>

心怀抱负的学员们面临诸多障碍，包括（神学院）偏向于招收年轻申请者（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文化考试和由当地宗教事务局通过背景审查进行的政治审核。过多的申请人和有限的名额使得神学院在招生条件上非常苛刻。毕业生还必须完成另外一整套步骤才能成为“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牧师，包括在教堂见习和神职任命，所有这些都要受到宗教事务局的严密监督并且要得到“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各级领导们的批准。

对于天主教而言，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是遴选和任命主教的机构，包括那些未获得梵蒂冈认可的主教。近年来，（政府的）一种做法在政府认可的神职人员中引起不满，政府官员们

有时会强迫那些经梵蒂冈认可而获得神职任命的主教，去参加那些未获教宗同意的主教的任命仪式。而这些“不合法”主教出席其他各种不同宗教仪式或神学院毕业典礼同样加剧了紧张关系。<sup>91</sup>

政府培养和任命政治忠诚的神职人员的努力跟不上基督教在中国扩张的步伐，这也破坏了中共的既定目标。事实上，学者卡尔森·维拉（Carsten Vala）的实地调查显示，中共自己的一些管控措施——包括僵化的培训课程、对神学院申请人的政治审查，以及政府对教会任命和神学理论的干预——已经导致了“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牧师奇缺。反之，那些未注册教会在领导人培养方面则更加多元、灵活、简单和自主。这给信众，甚至“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培养的牧师提供了更多机会成为教会领导人，尽管会面临更多被袭扰的风险。<sup>92</sup>

4. **篡改基督教义和进行政治教育：**中共认为神学理论是左右信众政治取向的核心，并一直试图淡化基督教信仰的某些方面而倡导另外一些方面。1998年，“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丁光训主教提出了“神学思想建设”。他提倡“淡化”“因信称义”的传统教义，而强调做“守法好公民”，本质上是要鼓励中国的新教徒在宗教权威之上更要服从党的权威。丁光训还支持那些符合党的优先利益的教义解释，比如维护国家统一和提供社会福利等等。<sup>93</sup>

这种神学手段已经成为很多神学院培训课程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布道内容的基础。<sup>94</sup>

在神职人员进行定期的“政治教育”是神学院培训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2015年7月，上海当局强令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参加“再教育”学习班，主题是当时刚刚结束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sup>95</sup>与此同时，还投入大量资源以管制宗教书刊的出版，惩治那些印发非官方书刊的个人，并以从事“非法出版”的罪名对他们进行监禁。

5. **拘押和暴力镇压：**那些在非注册教会坚持领导工作和礼拜活动的人，以及反对或规避政府管控的人，都面临拘押、监禁甚至是酷刑的风险。绝大多数遭拘押的基督徒都受到了相对比较短期的拘留，从数小时的审问到15天的行政拘留不等。对于占遭拘留基督徒大部分的普通信众尤其如此。然而，每年总有一批主流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遭到长期居留，“被失踪”或被判入狱。

很多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抓捕和监禁案例涉及到教会领袖或神职人员，自2014年以来，他们在遭拘捕的基督徒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sup>96</sup>这或许显示了官员们正在采取一个更加一致的举措通过惩治神职人员来管控信众，但这也有可能是针对教会领袖们在与政府当局的互动中越发地敢言而做出的反应。

遭监禁的基督徒通过律师和家属定期传递他们遭遇酷刑的报告，<sup>97</sup>尽管受到这样的虐待基督徒并不比其他一些少数宗教团体更加普遍。反而是在近些年，基督徒似乎更容易遭遇拘禁之外的暴行，尤其是当他们对防暴警察和拆迁队的时候。

### 经济奖惩措施

与佛教寺院相反，地方官员通常不会将基督教堂和神学院看作潜在的带来收入的管道。但是，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一些党政官员正在鼓励或迫使基督教机构的领导人将他们掌握的资源转向一些能够吸引游客和建设地方经济的项目上。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卡尔森·维拉

## 政府培养和任命政治忠诚的神职人员的努力跟不上基督教在中国扩张的步伐。

(Carsten Vala) 引述了一名河南省宗教事务局干部的事例，此人说服了河南省新教神学院的领导人改变了校园的设计方案。修改后的校园设计方案包括一条有各种小吃摊位的步行街，一组描述《圣经》场景的真人大小的雕塑，和一座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大教堂。<sup>98</sup>

由于针对基督教日趋敌对的政治环境，地方官员类似的鼓励已经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在近年来一起最为人知的强拆案件中，浙江省温州市的三江教堂在经历了会众与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僵持之后于2014年4月被拆毁。有些官员辩称这座宏大教堂建筑的建造超出了许可范围，并以此为强拆行动辩护。然而，据一位熟悉案件细节的牧师说，“原本的计划并非要建这么大一座教堂，但是政府鼓励建造一个更大些的，因为……政府希望它变成一个旅游景点。”<sup>99</sup>

事实上，当地官员还曾经称之为“样板建筑”。<sup>100</sup> 但是当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3年底巡视该地区之后，地方官员们的计划出了岔子。夏宝龙对教堂建筑在周围风景中过分突出表示了忧虑，有些消息来源称是他亲自下达了强拆指令。<sup>101</sup> 在另外的一些案件中，地方官员自己下令拆除了一些位于市区的教堂，因为他们把这些地块用在更加有利可图的项目上。<sup>102</sup>

除了实体物业的破坏，中国官员还时常给基督徒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近年来有数十座官方认可的教堂遭到强拆，包括三江教堂，这些教堂都是靠当地会众的捐款建造的，有些案例中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这种方式造就了信众与他们的礼拜场所之间一种特别紧密的私人联系。当看到教堂建筑在他们眼前被粗暴拆毁时，这种私人联系更强化了他们对政府的失望之情。

政府还采取一种更为直接的处罚方式——向会众收缴罚款以阻止他们参加非官方教会。隶属“三自爱国运动”的基督徒也同样被处罚款，从而防范其他政府任命的宗教领袖的公开反抗。例如，“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牧师张少杰在2014年被判处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合1.6万美元）。这一判决促使有关当局向张少杰的家属施压，让他们搬出自己的家从而可以将房屋拍卖。<sup>103</sup> 抢夺和没收房产——包括个人贵重物品——是镇压非官方教会、牧师和成员的惯常做法。<sup>104</sup> 而政府工作人员一旦被发现有参与地下宗教活动，则会遭受无薪停职到开除公职等等经济报复。<sup>105</sup> 自2014年以来，四川和贵州的一些家庭由于参加地下教会的活动而被暂停了社会福利待遇，<sup>106</sup> 或是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的孩子随同父母参加活动，那么将来的教育机会将会受到限制。<sup>107</sup>

## 社会反响和抵制

中国的基督徒们对严格的规章制度、社团管控和周期性的迫害运动用各种不同方式作出了反应。这些反应跨越了注册和未注册教会，进一步模糊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些年官方敌对态度的加强，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在政府认可的教会领导人和信众中间也相应地增加了，并导致他们采取更多的应对手段。

不过，中国基督徒最普遍的抵制方式或许只是去政府指定地点之外去寻求更多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有时这是得到官方默许的，他们并不直接挑战政府的宗教政策或是试图改变政治制度。这些努力包括：

- 1. 无声地回避限制：** 很多基督教领袖和世俗信众各自每天都会设法扩展自主宗教活动的空间，同时避免来自有关当局的打击报复。非官方教会的会众和查经小组会在私人房屋、办公场所，或是饭店会议室等处聚会，而拒绝去官方指定的场所进行礼拜。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学者苏珊·麦凯西 (Susan McCarthy) 描述了在北京的政府认可的天主教进德公益基金会 (Jinde Charities)，那些神父、修女和志愿者们是如何把宗教象征和精神意涵

近年来有数十座官方认可的教堂遭到强拆，这些教堂都是靠当地会众的捐款建造的，有些案例中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巧妙地融入到他们的慈善项目当中。<sup>108</sup> 世俗社会活动——像参加马拉松、举办圣诞慈善晚会或是提供地震救援——对于宗教组织的工作人员个人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同时也是展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的一个手段。

另外一个例子是，有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注册和非注册会众团体的基督徒，在特定的时间参加了由设在香港的远东广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主办的培训节目。这套获得“三自爱国教会”许可的广播节目，在复杂的、政治化的官方神学院之外，提供一个替代性的、低风险的培训管道。<sup>109</sup> 其他自主学习的机会包括中国境外提供的在线神学院课程、由海外牧师和学者在访华期间举办的非官方研讨会，以及通过像微信这样的应用程序分享的宗教媒体内容。<sup>110</sup>

这一系列抵制行动的另一个极端是，很多基督徒从事被政府禁止的活动，并想方设法保持隐密。他们参加在农村山区举办的培训讲习班，他们在屋子里装备隔音暗室来举行地下宗教聚会，印制和散发非官方的宗教出版物，或是通过陆路逃往东南亚国家。<sup>111</sup>

## 一些警察在突击检查和镇压行动开始前向非官方教会的领导人发出警告。

**2. 发展与地方官员的合作关系：**很多非官方教会一直寻求与当地干部、警察和宗教事务局的人士培养积极的关系。他们努力对指派来监视他们的警官以礼相待，坦率地告知他们聚会时间，或者力争展示他们是好人——没有兴趣激起社会纷争。<sup>112</sup> 相应的，一些官员会在他们的辖区内默许“家庭教会”的存在，而警察在突击检查和镇压行动开始前向非官方教会的领导人发出警告。<sup>113</sup> 这种态势大大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并且使得非注册会众可以建造正规的教堂建筑。近些年随着针对基督教的总体政治环境的恶化，尚不清楚这种类型关系的空间有了多大程度的缩减。

**3. 法律行动和教育：**当遭遇抓捕或财产纠纷时，无论是注册或未注册教会的领导人和成员都会与维权律师合作，来提起行政诉讼或是在法庭上为他们的清白和宗教自由进行辩护。尽管有遭遇打击报复的风险（包括针对律师自己），尽管成功的希望渺茫，这些努力依然在继续。<sup>116</sup> 在过去十年里，一位基督教维权人士为全国各地的基督徒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尤其是为那些来自未注册教会的信众，教育他们有关在中国的法律之下他们自身的权利并且帮助他们辨别官方的那些行动是违法的。据报导，这些课程以及中国基督徒法律意识的广泛提高，已经为那些草根信众提供了谈判策略和论据，从而可以在与当地警方的交流中得以运用，并且在一些案件中阻止了粗暴的迫害行动。<sup>117</sup>

尽管上述方式在某些时候证明是有效的，但是面对愈演愈烈的打击或者说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有些基督教领袖和信众已经转而采取更加公开和对抗性的战术来抵制政府侵权或要求更加自由的注册登记政策。值得关注的是，自2013年以来，更多来自政府认可教会的基督徒和甚至那些“爱国”协会自己也已采取这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吁求。在很多事例中，这种更加果断的态度已经招致当局的打压，包括拘留、监禁和殴打。公开抵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对政府行为发表书面抗议信：**无论是一些知名人士还是教会领袖集体或教友团体，都曾向政府有关部门递交过公开信或请愿书；这些文件然后被发布在网络上，或是通过社交媒体流传。2014年之后，写作和发表了很多这样的信件，向省和国家当局呼吁在浙江省停止移除十字架和强拆教堂的运动。引人注目的是，有很多公开信来自政府认可的教会下属的个人或机构，包括省属的“爱国”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和由政府批准的朱维方主教领导的温州天主教神职人员。<sup>116</sup>

**2. 抵制被认为“不合法”神职人员参加的宗教仪式：**一些天主教徒一直拒绝参加或参与有未获教宗认可的8名主教出席的庆祝仪式。在2012年的神职任命仪式上，上海主教马达钦灵

巧地拥抱了3位“不合法”主教，没有让他们在他身上履行“覆手礼”仪式。<sup>117</sup> 2014年7月，北京的一所官方神学院宣布一位被梵蒂冈逐出教会的主教将会主持毕业弥撒，这个班级的毕业生拒绝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sup>118</sup>

- 3. 进行户外礼拜：**当未注册教会因政府向房东施压或是政府其他形式的阻挠而被逐出他们的聚会场所，有些人会代之以在公共场所进行礼拜。近年来最突出的案例是北京的守望教会。它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非官方会众群体，2009年被迫搬离他们的聚会地点，教会领导人开始在公共广场或公园进行祈祷活动。然而在经历几轮抓捕之后，政府的镇压措施似乎在2015年获得成效，教会信众分散成规模更小的“家庭教会”团体或其他形式的会众团体。<sup>119</sup>
- 4. 用身体阻挡强拆教堂和移除十字架：**在过去数年的很多场合里，大批信众——有时一次有数百人——聚集在受到威胁的礼拜场所，手挽手组成“人墙”，进行静坐并且歌唱赞美诗，或是堆起石块阻断进入场地的通道。<sup>120</sup> 在有些案例中，镇暴警察和拆迁队强制驱散聚集的人群，不过尤其在一些比较小的村庄或是比较低调的教堂，信众们成功了阻止了拆毁。

据浙江的一位牧师说，这些方式只是阻止了“相当少”的拆除十字架行动。在另外一些案件中，他说，会众们“在十字架被移除之后，马上又竖起了新的。”还有一种更加间接一些的响应方式，有些基督徒制作了大量尺寸较小的十字架，可以放在车上，房屋上，或是路边，以此来挫败政府此次运动的关键目标——降低这一地区基督教存在的可见度。维权人士则通过照片或影片记录他们的努力，并将这些数据在国内外流传，以期达到最大的影响力。

## 未来展望

2012年11月以来，中国当局加强打压基督徒尤其新教徒的行动似乎达到了某些目的。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明显不如四年以前那么显而易见了，传播他们信仰的“类基督教”团体的成员减少了很多，一些维权律师和政府认可的教堂领袖们在藐视政府命令之前要三思而行了。

不过从中共的观点看，政府的行为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尽管注册教会和非注册教会之间界限的模糊已有一段时间，但日益加强的迫害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基督教两大社群之间的团结，也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团结。拆除十字架尤其成为了中国基督徒之间凝聚力的关键纽带。这一原因，再加上与一些官员个人有关的因素，或许导致了拆除十字架的行动没有从浙江扩散到其他省份。

尽管如此，在未来的几年里，其他加强管控的因素和强制性的基督教“中国化”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出现。如果当前袭扰和监禁“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及其领袖的轨迹延续下去，非官方教会将会更没有理由去注册，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袖和成员们甚至可能会选择“叛变”，转而大批投向非注册教会。

对于天主教而言，就在本文写作时，在梵蒂冈和北京之间有关主教任命问题的一个协议似乎呼之欲出。如果这一突破最终实现，那么双边最重要的问题将是这个协议能否减少中国的草根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如果不能，那么梵蒂冈将进退两难——如何做出不失原则操守的响应，同时还要避免新协议不至于破裂。对于像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Joseph Zen Ze-kun）这样怀疑这笔交易的人，这将是让人忧心忡忡的场景。

日益加强的迫害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基督教两大社群之间的团结，也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团结。

## 注解

1.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警告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美联社，2016年4月24日，<http://bigstory.ap.org/article/0181dc9eb62b4c91ae76818b97c17eb0/chinas-xi-warns-against-religious-infiltration-abroad>.
2. China Change, “Christian Sentiment in Zhejiang against Cross Removal: Three Statements,” August 7, 2015, <https://chinachange.org/2015/08/07/christian-sentiment-in-zhejiang-against-cross-removal-three-statements/>.
3. 《中国基督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by Daniel H. Bays, United Kingdom: Wiley-Blackwell, 2012.
4. “中国基督教协会”，Academic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http://contemporary\\_chinese\\_culture.academic.ru/126/China\\_Christian\\_Council](http://contemporary_chinese_culture.academic.ru/126/China_Christian_Council).
5.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Berkley Center for Religion, Peace & World Affairs), <https://berkeleycenter.georgetown.edu/organizations/china-patriotic-catholic-association>.
6. 中国当局用“邪教”一词来指称那些非正统宗教团体。中国政府机构和国家媒体时常用一个有些误导的英文翻译，即evil cult (邪恶的狂热信徒或教派)来妖魔化那些被贴上“邪教”标签的团体。而英语中“Heterodox religion”一词更加贴切表达“非正统宗教”的原意，因而为本报告英文版所采用。
7. 一个例子是2011年对湖北省“华南教会”的镇压。
8.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07年度报告》，2007年5月，[http://www.uscirf.gov/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AR\\_2007/annualreport2007.pdf](http://www.uscirf.gov/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AR_2007/annualreport2007.pdf).
9. 这个总数在之后几年有所扩大，在2016年达到了16座主要教堂和49处下属聚会地点。见《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网站(<http://www.bjccspm.org>)，本报告获取资料日期为2016年11月29日；《中国2005版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下中国新教家庭教会的注册：解决实际操作中的僵局》，作者：Lauren Homer，原载：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52, no. 1 (2010): 50-73.
10. 《圣父牧函》——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2007年5月27日，[http://w2.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i/en/letters/2007/documents/hf\\_ben-xvi\\_let\\_20070527\\_china.html](http://w2.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i/en/letters/2007/documents/hf_ben-xvi_let_20070527_china.html).
11. 极权中国的基督新教和公民社会：官方教会和未注册“城市教会”对2000年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作者：Carsten Vala，原载：《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no. 2012/3 (October 1, 2012): 43-52.
12. 同上。
13. 《中国新教家庭教会的注册》(见注9)，作者：Lauren Homer。
14. 同注11。
15. 与Carsten Vala的电子邮件交流，2016年11月。
16. 《与党国打太极：中国改革年代的非官方新教团体》，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原载：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no. 1 (April 25, 2013): 1-20.
17. 《我国宗教的基本情况》，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2014年4月1日，<http://www.sara.gov.cn/llyj/63734.htm>.
18. 《全球基督教：关于世界基督教人口规模与分布的报告》，附录C：对中国的研究方法，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12月19日，<http://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19. 见亚洲丰收会(Asia Harvest)的例子，《基督教人口》，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29日，<http://asiaharvest.org/wp-content/uploads/christians-in-china/China.htm>。有关亚洲丰收会的研究方法，见Paul Hattaway所著《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对全文的简要总结》(How Many Christians Are in China? A Brief Summary of Our Full Article)，亚洲丰收会(Asia Harvest)，<http://asiaharvest.org/how-many-christians-are-in-china-summary/>。
20. 亦见于《天主教在当今中国》(Catholicism in China Today)，作者：Tom McGregor, Crisis Magazine, 2013年8月15日，<http://www.crisismagazine.com/2013/catholicism-in-china-today>。
21. 《中国天主教的悲剧与新兴公民社会中的希望》(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前言：中国天主教的来龙去脉”，作者：Richard Mads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2. 《神在地上：一个中国村庄里的天主教会、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跨国流程》，作者：Eriberto Lozada, J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我国宗教的基本情况》，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24. 《建造中国的耶路撒冷》，作者：曹南来，(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信仰之盾：基督教在当代中国》，作者：Francis Khok Gee Li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6. 同上。亦见《中国宗教的红黑灰市场》，作者：杨凤岗，《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ly) 47: 93-122.
27. 《中国家庭教会的兴起：组织化的武器》，作者：Karrie Koesel,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June 2013)。
28. 《无网之渔：中国的非官方新教教会吸纳新人》，作者：Carsten Vala、Kevin J. O' Brien, Mobilization 12, no. 1 (March 2007): 79-94.
29. 《2012年有关中国大陆迫害基督徒和教会的年度报告》，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2013年2月2日，<http://www.chinaaid.org/2013/02/chinaaid-releases-2012-annual-report-on.html>。
30. 对华援助协会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一份中共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这是一项更为系统性的“铲除”家庭教会的运动的一部分。见《对华援助协会报告：中国政府开展新运动铲除家庭教会》，2012年4月22日，<http://www.chinaaid.org>。

- org/2012/04/chinaaid-special-report-chinese.html.
31. 对华援助协会,《2013年的迫害报告显示迫害案件呈上升趋势》,2014年2月13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4/02/china-aid-association-2013-persecution.html>.
  32. 对华援助协会,《2013年的迫害报告显示迫害案件呈上升趋势》,2015年4月21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5/04/china-aid-2014-annual-report-indicates.html>. 亦见《活动人士说,中国强拆“非法”教堂的运动还在继续》,作者: Tom Phillips, Telegraph, 2015年4月15日,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1537435/Chinas-evil-church-demolition-campaign-continues-say-activists.html>.
  33. 对华援助协会,《2015年度中国政府迫害报告》,2016年5月18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5/china-aid-releases-2015-annual-report.html>.
  34. 《浙江两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国或进一步限制基督教》,作者: 张彦 (Ian Johnson), 纽约时报, 2016年5月23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523/c23chinacross/>;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6年度报告》,2016年10月6日, <https://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2016%20Annual%20Report.pdf>.
  35. 《十七座十字架被毁,当局威胁强拆》,作者: Qiao Nong, Carolyn Song, Brynne Lawrence,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3月8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3/17-crosses-destroyed-authorities.html>.
  36.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 中国政府在浙江省大规模拆除十字架》,作者: 曹雅学, China Change, 2015年7月26日, <https://chinachange.org/2015/07/29/interview-with-a-wenzhou-pastor-the-chinese-governments-large-scale-destruction-of-crosses-in-zhejiang-province/>.
  37. 《坍塌的尖顶汇聚中国政教冲突》,作者: 张彦 (Ian Johnson), 纽约时报, 2014年5月29日, <http://www.nytimes.com/2014/05/30/world/asia/church-state-clash-in-china-coalesces-around-a-toppled-spire.html>.
  38. 《牧师妻子遇害的河南省教堂赢得土地使用权》,作者: Ava Collins,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4月27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4/henan-church-wins-rights-to-land-where.html>; 《政府打压,十字架被拆,教堂被毁》,作者: Qiao Nong, Carolyn Song 和 Brynne Lawrence,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1月8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1/crosses-removed-churches-demolished-in.html>; 《安徽省政府在批准教堂建筑用地后发布拆迁通告》,作者: Rachel Ritchie, 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3月31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5/03/anhui-government-issues-demolition.html>.
  39. 《与党国打太极: 中国改革年代的非官方新教团体》,作者: 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另据对华援助协会的资料,2013年浙江全省的迫害事件不到10起。这个数字在2014年跃升至数十起,被拘押人数超过1万。
  40.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 中国政府在浙江省大规模拆除十字架》,作者: 曹雅学, China Change, 2015年7月26日, <https://chinachange.org/tag/xia-baolong/>.
  41. 在最初的抗议之后,当局逮捕了两人有关负责人并在后来承认这块地皮是属于教堂的宗教场所用地。见《教会领袖妻子因抗议强拆教堂遭中国当局活埋》,作者: Stoyan Zaimov, Christian Post, 2016年4月19日, <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china-church-leaders-wife-buried-alive-killed-for-protesting-church-demolition-162067>; 《河南牧师妻子之死反映了一个全国性问题》,作者: Brent Fulton, China Source (blog), June 1, 2016, <http://www.chinasource.org/blog/posts/death-of-henan-pastors-wife-points-to-nationwide-problem>; 《牧师妻子遇害的河南省教堂赢得土地使用权》,作者: Ava Collins.
  42. 他的妻子被判入狱12年。见《抵制拆除十字架的中国牧师因贪污罪被捕入狱》,BBC, 2016年2月26日,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673952>.
  43. 他在三月底被释放,改为“监视居住”,即软禁。见《中国: 顾约瑟牧师获释后被“监视居住”》,稿件来源: 对华援助协会, Church in Chains, 2016年4月6日, <http://www.churchinchains.ie/node/873>; 《中国牧师顾约瑟因贪污罪名遭调查》,BBC, February 1,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457150>; 《中国打压基督教会》,作者: Brendon Hong, Daily Beast (blog), May 8, 2016,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6/05/08/china-s-crackdown-on-christian-churches.html>.
  44. 《对张少杰牧师的重判凸显中国对基督教越发不宽容》,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 2014年11月3日, <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pastor-zhang-shaojie%E2%80%99s-harsh-sentence-highlights-china%E2%80%99s-increasing>.
  45.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 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46. 《麦当劳残忍杀人案背后的邪教组织相信耶稣已经作为一个女人复临》,作者: Terrence McCoy, 悉尼先驱晨报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4年10月14日, <http://www.smh.com.au/world/the-chinese-cult-behind-a-brutal-mcdonalds-murder-believes-jesus-has-returned-as-a-woman-20141013-115kr6.html>.
  47. 在判决样本中另外8个信徒遭到惩罚的团体分别是: 门徒会、血水圣灵 (亦称圣灵重建教会)、呼喊派、灵灵派 (亦称属灵教、灵灵教)、三班仆人派、主神教、心灵派和约瑟夫之家。档案于2016年6月从最高人民法院网上数据库收集和下载,并进行分类和分析。自2014年1月1日开始,中国各个法庭按照要求必须在网上公布判决结果,这使得可以获得的判词数量显著增加,其中包括一些涉及宗教迫害的敏感判决。尽管如此,这个数据库依然不够全面,有些判决个案时常被移除。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29日, <http://wenshu.court.gov.cn>.
  48. 仅有的三个出现的省级行政单位是天津、重庆和西藏。
  49. 全能神教,也称东方闪电,1990年代早期开始于河南省,有些国际专家也认为它是一种邪教。除了像“麦当劳事件”这样见诸报端的暴力事件之外,它饱受争议的地方还有它的核心信仰——认为耶稣通过一个中国女人的身体复临人间以及信徒必须切断与他们家庭的关系等等。《东方闪电从何而来?》,作者: William Bennett, China Source, 2014年4月4日, <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where-did-eastern-lightning-come-from>; 《探究中国最激进邪教团体》,作者: Malcolm Moore, Telegraph, 2015年2月2日,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1046155/Inside-Chinas-most-radical-cult.html>.
  50. 《2014年度报告: 中共的宗教与人权迫害》,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4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Z24UfutRtHodGVzbWhyLUtCdJg/view>; 国家媒体报导称,从2014年5月至8月,有超过1000名全能神教成员被捕。《探究中国最激进邪教团体》,作者: Malcolm Moore.

51.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52. 《中国媒体公告栏 第113期》，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2016年3月，[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CMB113\\_English-FINAL.pdf](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CMB113_English-FINAL.pdf)；《赵薇失踪的那一天：中国全面限制人权，年轻法学研究生被捕》，作者：Tom Phillips, Guardian, 2016年1月24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an/25/zhao-wei-mothers-search-for-daughter-caught-china-human-rights>；《赵薇获释，很多律师依然身陷囹圄》，China Digital Times, 2016年7月7日，<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6/07/zhao-wei-released-year-detention>。
53. 《至少18名人权捍卫者在被拘押两个月后依然下落不明》，Front Line Defenders, 2015年9月14日，<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case-history-li-heping>；《李和平律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正式逮捕令》，Human Rights In China, 2016年1月8日，<http://www.hrichina.org/en/official-notice-arrest-lawyer-li-heping-suspicion-subversion-state-power>。
54. 《圣诞节为何在中国广受欢迎》Robert Foyle Hunwick, “Why Christmas Is Huge in China,” Atlantic, 2014年12月24日，<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12/why-christmas-is-huge-in-china/384040>。
55. 对付希秋 (Bob Fu, 对华援助协会执行董事) 的采访, 2016年9月。
56. 《圣诞节在中国大学因“低俗”被禁止》，Telegraph (London), 2014年12月25日，<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1313212/Christmas-banned-by-Chinese-university-because-its-kitsch.html>。
57.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58. 《中共党员人数超过德国人口》，Agence France-Presse, 2015年6月30日，<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829407/chinas-communist-party-enlists-million-new-members>。
59. 有关哪些因素引发中共发动打击宗教团体的详细分析, 见本报告法轮功部分。
60. 《坍塌的尖顶汇聚中国政教冲突》，作者：张彦 (Ian Johnson), 纽约时报, 2014年5月29日，[http://www.nytimes.com/2014/05/30/world/asia/church-state-clash-in-china-coalesces-around-a-toppled-spire.html?\\_r=0](http://www.nytimes.com/2014/05/30/world/asia/church-state-clash-in-china-coalesces-around-a-toppled-spire.html?_r=0)。
61. 《全国宗教会议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作者：邢福增, Stand News, 2016年4月30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5%85%A8%E5%9C%88%E5%AE%97%E6%95%99%E5%B7%A5%E4%BD%9C%E6%9C%83%E8%AD%B0%E8%A9%95-%E4%B8%AD%E5%9C%8B%E7%89%B9%E8%89%B2%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5%AE%97%E6%95%99%E7%90%86%E8%AB%96/>。
62. 对一位希望匿名的中国牧师的访谈, 2016年6月。亦见于《‘五进五化’旨在彻底改造和控制基督教》，作者：郭宝胜, 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9月3日，[http://www.chinaaid.net/2015/09/blog-post\\_89.html](http://www.chinaaid.net/2015/09/blog-post_89.html)。
63. 例如，浙江省的一个官方网站上有关兰溪市的报导称，该市的69处宗教场所都已悬挂国旗，包括教堂。见浙江省民族宗教委员会网站的报导《兰溪落实全省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率先实现宗教场所国旗悬挂全覆盖》，<http://www.zjsmzw.gov.cn/Public/NewsInfo.aspx?type=1&id=ef5d4c32-65ff-4274-8d4b-f0d1b1249edd>。
64. 2016年6月，“三自爱国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宣布启动一项新的方案，推广基督教和“茶文化”。他们要求牧师和教会领导人在这个城市推广这项运动并征集以“基督教与茶”、“茶与基督徒灵修”、“茶与福音事工”为主题的文章。[http://www.ccctspm.org/news/lo\\_ex/2016/718/16718405.html](http://www.ccctspm.org/news/lo_ex/2016/718/16718405.html)；(原文注释无网页连结，为译者添加)。
65. 《中国政府正在改变基督教政策？》，作者：Peter Berger, American Interest, 2014年6月11日，<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4/06/11/is-the-chinese-regime-changing-its-policy-toward-christianity/>。
66. 同上。
67. 《习近平传记》，中国名人录网站 (China Vitae)，[http://www.chinavitae.com/biography/xi\\_jinping/full](http://www.chinavitae.com/biography/xi_jinping/full)。
68.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作者：曹雅学。
69. 截至2014年7月31日，据信在这场运动中，有至少229座基督教堂被强拆或是十字架被移除。其中包括公开或地下的25座天主教堂。《中国教会新闻2014》，圣神研究中心, Tripod 35, no. 176 (2015春季)，[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
70. 《教宗方济各敦促世界无需惧怕中国崛起》，作者：Francesco Sisci, Asia Times, 2016年2月2日，<http://www.atimes.com/at-exclusive-pope-francis-urges-world-not-to-fear-chinas-rise/>。
71. 首次会谈于2014年6月举行，随后在中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谈分别于2015年10月和2016年1月举行。
72. 梵蒂冈电台报导，2013年12月24日，中国的50家主要媒体将教宗方济各列为2013年度最重要的10位外国人中的第三位。2014年3月，《梵蒂冈内部通讯》的一篇文章报导说，自教宗方济各就职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站发表他的消息、言论和训诫。《中国教会新闻2014》，圣神研究中心, Tripod 35, no. 176 (2015春季)，[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
73. 《中国新主教显示与梵蒂冈关系有望改善》，作者：Michael Forsythe, 纽约时报, 2015年8月5日，[http://www.nytimes.com/2015/08/06/world/asia/china-ordains-bishop-joseph-zhang-yinlin.html?\\_r=0](http://www.nytimes.com/2015/08/06/world/asia/china-ordains-bishop-joseph-zhang-yinlin.html?_r=0)。
74. 《教宗与政治局》，作者：Victor Gaetan, Foreign Affairs, 2016年3月24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6-03-24/pope-and-politburo>。
75. 同上。《中国教会新闻2014》，圣神研究中心, Tripod 35, no. 176 (2015春季)，[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
76. 同上。
77. 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6年发表的一份著名政治犯名单中，有11名天主教徒，其中五人在2013至2015年间被拘押在河北和黑龙江。《中国政治犯名单》，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 2016年10月11日，[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CECC%20Pris%20List\\_20161011\\_1433.pdf](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CECC%20Pris%20List_20161011_1433.pdf)。
78. 《中国主教改变对官方教会立场震惊信众》，作者：David Barrett, Catholic Herald, 2016年6月17日<http://www.catholicherald.co.uk/news/2016/06/17/chinese-bishop-shocks-faithful-by-recanting-position-on-state-run-church/>。

79. 《中国教会谜题：马主教为何改变立场？》，作者：Brian Fraga, 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2016年6月30日, <http://www.ncregister.com/daily-news/chinese-church-conundrum-why-did-bishop-ma-recant-criticism>.
80. 《梵蒂冈对上海马达钦主教事件保持沉默引起困惑和争议》，作者：Bernardo Cervellera, Asia Times, 2016年6月21日, <http://www.asianews.it/news-en/Vatican-silence-over-Shanghai%E2%80%99s-Mgr-Ma-Daqin-causing-confusion-and-controversy-37831.html>.
81. 《中国加强管制天主教会主教任命》，作者：Gerard O' Connell, 《梵蒂冈内部通讯》Vatican Insider, 2015年5月23日, <http://www.lastampa.it/2013/05/23/vaticaninsider/eng/world-news/china-tightens-rules-for-appointment-of-bishops-in-catholic-church-rJGAItEa2n6BYLT7cGnMXJ/pagina.html>.
82. 《教宗与政治局》，作者：Victor Gaetan.
83. 《管制的信心：中国的宗教管制》，作者：Pitman B. Potter, China Quarterly, no. 174 (2003): 317-37.
84.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85. 《中国新教家庭教会的注册》，作者：Homer.
86. 《官方终止教会租赁，命令所有家庭教会注册》，作者：Qiao Nong, 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12月30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5/12/officials-terminate-churchs-lease-order.html>.
87. 到2015年，经过数年禁止守望教会租赁室内场所以及暴力镇压教会尝试在室外公共场所举行礼拜活动，官方的努力似乎获得成效。守望教会的信众分散成了更小的团体或者加入了其他教会团体。
88. 南乐教堂和三江教堂是两个尤其突出的例子。
89. 《通往讲坛之路：中国基督教“爱国”教会和地下教会的领导人培养》，作者：Carsten Vala, 收录于《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编辑：Yoshiko Ashiwa、David L. W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90. 《通往讲坛之路》，作者：Vala; 《重新开放30年之后的中国神学院》，Sunday Examiner, 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19日, <http://sundayex.catholic.org.hk/node/1914>.
91. 《中国政府持续强迫已登记的天主教主教》U.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2016年6月2日,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chinese-government-continues-to-coerce-registered-catholic-bishops>.
92. 《通往讲坛之路》，作者：Vala.
93. 同上。
94. 中国基督教协会（CCC）创建于1980年，是另一个政府下属机构，与“三自爱国教会”密切合作，致力于提供信众的培训、神学指导和《圣经》印发，并探索如何实现基督教神学中国化。其宗旨是“以《圣经》为依据，扎根中国文化，结合中国教会的特殊经验，在现代中国环境下为基督教信仰提供可靠解释。”见 Global Ministries,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19日, [http://www.globalministries.org/eap\\_partners\\_china\\_christian\\_council](http://www.globalministries.org/eap_partners_china_christian_council).
95. 《上海牧师、修女被迫参加再教育学习班》，UCA News, 2015年7月9日, <http://www.ucanews.com/news/shanghai-priests-nuns-forced-to-undergo-reeducation-classes/73901>.
96. 由美国对华援助协会汇总的数据显示，在2011至2013年期间，宗教领袖占被迫害和拘押的基督徒总数的3.5%。这个比例在2014年跃升至15%，2015年保持了同样水平。
97. 《遭酷刑牧师妻子受到威胁，律师提起诉讼》，作者：Brynne Lawrence,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6月13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6/tortured-pastors-life-threatened.html>.
98. 《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作者：Carsten Vala, 收录于《The Chinese Corporatist State: Adaption, Survival, and Resistance》，编辑：Jennifer Y.J. Hsu、Reza Hasma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99.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作者：曹雅学。
100. 《温州强拆教堂，基督徒忧心忡忡》，作者：Julie Makinen, Los Angeles Times, 2014年5月5日, <http://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church-20140506-story.html>.
101. 同上。
102. 采访洛约拉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Carsten Vala, 2016年9月。对房产物业的各种不同形式没收与强拆在中国非常普遍，这经常成为国家与教会紧张关系的催化剂。见《社会抗议与饱受争议的集权主义》(Social 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作者：Chen Xi, (Cambridge, 2012)。
103. 《对张少杰牧师的重判》，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
104.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105.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106. 《政府终止基督徒的社会福利》，作者：Qiao Nong,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8月9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8/government-terminates-welfare-for.html>.
107. 《中国：基督徒被威胁取消社会福利，除非停止去教堂》，作者：Carey Lodge, Christian Today, 2016年8月10日, <http://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china.christians.threatened.with.having.welfare.payments.cut.unless.they.stop.going.to.church/92814.htm>.
108. 服务社会，重塑国家：中国的宗教慈善活动与抗争》，作者：Susan McCarthy, China Journal 70 (July 2013): 48-72.
109.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110. 与希望匿名的中国基督教研究者的电子邮件交流, 2016年11月。

111.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被关押中国牧师的女儿在美国强调父亲教会的困境》，作者：Qiao Long and Shi Shan，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7月21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daughter-07212014180702.html>。
112. 《家庭教会如何看待政府当局》，作者：Kay Danielson，China Source，2013年12月9日，<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house-church-attitudes-towards-government-authorities>。
113.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114. 《温州家庭教会领袖遭当局殴打》，对华援助协会，2016年5月16日，<http://www.chinaaid.org/2016/05/wenzhou-house-church-leader-beaten-by.html>；《中国基督徒采取法律手段反对非法迫害》，对华援助协会，2016年2月19日，<http://www.chinaaid.org/2016/02/christians-take-legal-action-against.html>。
115. 有关在2014年活动人士博爱（音译）举办的讲习班及其影响的趣闻轶事见《中国各地举办法律与宗教培训讲习班》，对华援助协会，2014年3月13日，<http://www.chinaaid.org/2014/03/law-and-religious-training-seminars.html>。若干讲习班于2015年和2016年在重庆、云南、河南、辽宁和北京举办。有关草根信众如何利用法律知识要求当局出示搜查证的事例见《中国的法治雏鹰》，作者：Tony Carnes，Christianity Today，2006年9月18日，<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6/september/china-civil-rights-movement.html>。
116. 浙江基督教协会公开信的英文翻译和其他事例，见《浙江基督徒如何看待拆除十字架：三份声明》，China Change，2015年8月7日，<https://chinachange.org/2015/08/07/christian-sentiment-in-zhejiang-against-cross-removal-three-statements/>。朱主教据报导发表了两封信，一封在2014年年中敦促政府停止拆除十字架，另一封措辞更加强烈的与其他神职人员联署的信件发表于2015年年中。主教本人在2016年9月因病逝世。见《号召为反对拆除十字架大声疾呼》，纽约时报，2015年8月7日，[http://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5/08/07/a-call-to-cry-out-against-cross-removals-in-china/?\\_r=0](http://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5/08/07/a-call-to-cry-out-against-cross-removals-in-china/?_r=0)。
117. 《特别报导：勇敢面对北京的主教》，作者Sui-Lee Wee，路透社，2014年3月31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atholics-special-report-idUSBREA3001820140401>。
118. 《北京神学院毕业生拒绝参加毕业典礼：我们不参加非法主教主持的弥撒》，Asia News，2014年7月18日，<http://www.asianews.it/news-en/Beijing,-seminarians-desert-graduation-ceremony:-We-will-not-celebrate-Mass-with-illegitimate-bishops-31658.html>。
119. 《遭到驱逐的“非法教会”力图反抗北京》，作者：Andrew Jacobs，纽约时报，2011年4月17日，<http://www.nytimes.com/2011/04/18/world/asia/18beijing.html>。
120.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作者：曹雅学。



自由之家是一个非营利、  
无党派机构，支持民主变  
化，监督自由，倡导民主  
和人权。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120 Wall Street, 2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5

[www.freedomhouse.org](http://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https://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https://twitter.com/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mailto:info@freedomhouse.org)

---